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一举多得

任寿根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要达到4.5万亿元,并提出加强节能技术改造、实施污染治理重点工程、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快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可谓一举多得,既可以有助实现生态文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可持续增长,又可以改善人们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因此,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就是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世界性潮流

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可以实现持续均衡增长,这是由经济体系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引发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且认为,税收政策、补贴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节能环保产业是一种由生产技术革新和进步所带来的新兴产业,它的出现和发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符合新增长理论思维的。

节能环保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是适应人们消费结构转变的一种融合新型技术的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符合世界性潮流。人们需要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无污染的食品,人们需要一个良好的

生存环境。这是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成为世界潮流的根本原因和根本动力所在。同时,应该看到,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本身,也需要技术生产要素的持续性投入,其结果是不仅能促进节能环保产业自身发展,而且对加速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也大有裨益。

节能环保产业市场规模非常大,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占据了其中的主要份额。节能环保产业主要包括推广高效锅炉、扩大高效电动机应用、发展蓄热式燃烧技术装备、高效废水处理、有序废弃物管理和大气污染控制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直都高度重视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中国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符合世界性潮流,对优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尤其是在水和废水处理这一块。美国节能环保产业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其中大多为中小企业,这为美国节能环保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美国节能环保技术主要出口到加拿大、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

德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不可小觑,德国的节能环保技术在世界上也是翘楚。节能环保产业也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以德国环保产业为例。德国环保产业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涉及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无公害食品行业、环保生产技术的专业性开发、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治理、废弃物再循环等。

中国正面临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任务,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之一符合这一重大经济发展任务。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难以继。中国应采取新增长理论所提倡的技术推动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发展模式,依靠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同时,还应看到,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发展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目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模式应彻底摒弃。供应无公害食品,供应清洁水等已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意义非常重大。而且,从长期来看,节能环保产业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吸取西方经验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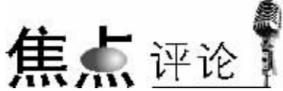
发达国家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方面起步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方面的共同特点是政府与市场共同推动,通过两者的合力达到预期效果。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途径可以通过采取技术实现低排放、低能耗、循环再利用等等。

美国政府推进措施的特色是采取“绿色税收”、“绿色收费”的方式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美国推行绿色税收的具体措施包括出台税收奖励制度鼓励环保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对排污企业征税、把税收与环保表现挂钩等等。从理论

上看,绿色税收就是运用税收手段对“外部性”的一种征税、一种矫正。采取绿色税收这一招是很管用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过发挥税收机制限制企业或“惩罚”企业的排污行为。

实行绿色税收这一理念已得到国际广泛认可和采用。中国应加快推行绿色税收的步伐,完善绿色税收体系,在现行税制框架内强化绿色税收的作用、突出绿色税收的功能,同时可以采取美国绿色收费的方式,通过绿色收费体现污染与付费的一一对称性特征。中国强化绿色税收、绿色收费的作用可以起到约束企业排污行为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双重效果。

美国市场推进措施是开展环境保险业务,包括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和环保咨询、环保服务保险等。美国环境保险业务的做法值得中国进一步借鉴和学习。德国政府与市场在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不遗余力地强化企业和居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在最大可能情况下发展环保技术和环境无害的产品和生产工艺。这两点格外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中国的一些企业和个人节能环保意识还不强,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节能环保理念推广的力度,使节能环保理念真正深入人心,这样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需求会大增,其结果是有利于节能环保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改进和推广。



楼市调控长效机制应市场化与重建市场并重

李宇嘉

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的框架渐清晰

自今年“两会”后,尽管新一届管理层在楼市的态度上避让正在坚持的“调控”,更加强调长效机制的构建,但对于长效机制何时出炉、有哪些具体内容等一直未有明确表态。而之前被寄予厚望的长效机制重磅内容——房产税、不动产登记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也因体制阻碍而顾虑重重、举步维艰,这让长效机制的眉目更加扑朔迷离。但近期,面对各地不断刷新历史的“地王”潮、房价持续上涨(百城房价连续14个月上涨)、重点城市二手住房价格屡创历史新高等,管理层一反往常“先表态”紧接着“出政策”的惯常套路,而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镇定表态来应对,这被业界和媒体解读为调控思路转变和长效机制构建的开始,即渐进退出行政性调控措施,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长效机制框架或将重点放在市场化

管理部门政策上一些微妙的变化也部分印证了业界和媒体的判断。例如,针对重点城市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遵从市场供求规律,加大土地供应力度。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用地供应8.24万公顷,比2012年多出了1/3多,比2011年多了1/6多。特别是,40个重点城市的土地成交更是同比多出了80%;暂停三年的房地产再融资开闸,这被解读为管理层希望通过“增加土地+增加融资”的方式来解决供求紧张局面,而温州松绑限购令并未被叫停,反而获得很多理性的支持,这是经济手段取代行政干预的信号,因为购房准入限制和融资限制是2010年以来行政性干预政策最大的两个杀手锏,并在随后的三年内被确认为城市政府不可跨越的两条红线。

同时,在短期内“稳增长”、中长期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房地产的综合地位显著上升,这也决定了上述长效机制思路设计的必然性。首先,增加房地产供应是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重要一笔,不管是3600万套保障房的剩余任务量,还是支持普通住房建设,对支撑全社会日渐衰退的投资意愿、消化房地产上游行业(煤炭、钢铁、建材等)的产能过剩,保持下游消费行业(纺织、家具家电和装饰装潢等)增长态势的意义不言而喻;其次,渐进消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实现财政再平衡、弥补过去市场化过快发展对民生的欠账(保障房、社保、环境治理、城市地下管网等),均无法丢掉土地的融资功能,而以人为的城镇化必须要让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在没有找到可靠的、可持续财源的情况下,土地和房地产的重要地位还无法卸下。

因此,如果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即使房价上涨,只要控制好金融杠杆、阻止房地产对实业的挤出、阻止地方政府以土地来谋投资和经济增长,同时加大住房供应力度,房地产市场化供应不仅可以为“稳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也能够为抓住“调结构”的战略机遇期做出重大贡献。毕竟,能否解决过剩产能、能否弥补历史欠

账、能否实现地方财政风险“软着陆”和再平衡,是能否顺利过渡到“调结构”的前提,而房地产市场化能够推进下去有利于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市场重建与市场化同样重要

毫无疑问,攻坚阻碍房地产市场运行和市场机制发挥中政府无效或低效干预的政策和体制,完成市场化的未竟之路,是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构建的重要内容。但是,实现房地产行业运行的长久健康,不是一个“市场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长期以来被工业化、政治化和妖魔化,房地产非但没有形成成熟的市场体系和机制,而且让房地产这个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行业、企业经营的基本要素、老百姓避风避雨的基本场所彻底变形。因此,长效机制建设就需要恢复房地产的本来面目,健全房地产基本功能,在这方面就是要做市场重建的功课。

首先,住房保障不能有名无实。促进市场化与解决市场失灵从来都是市场机制建设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市场化的住房配置必然意味着有的人存在住房困难。因此,没有住房保障就没有健康的住房市场,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但是,在目前各级政府眼里,“住房保障”不是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就是沦为政府及利益部门的福利,或者是为迎合上级的政治考核而以次充好、滥竽充数,基本与纠正市场失灵下的“住房问题”绝缘。市场化发展的另一方面就是填补不能市场化的部分(市场失灵),对于住房市场化来说就是做好与住房市场同等重要的住房保障,这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缺位和失位问题的根本。长效机制中要明确政府对于住房保障的“天然责任”,关键是保障与市场的边界要彻底划清,减少保障对市场的挤出,市场对保障的寻租;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要稳定,实现资金来源的财政预算化;保障房要获得与商品房一样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滥竽充数。

其次,租赁市场发展滞后不能不受重视。收入水平的差距决定了住房消费的层次性和不断升级的消费模式。绝大多数人群“先租后买”是常理,这意味着租赁市场不仅是住房供应的一环,而且是基础。但是,与极力控制房价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管理部门对于租金连续42个月上涨不闻不问;满足广大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城中村、旧住宅区等低租金市场不断萎缩;购房与户籍(进而与教育和社保)挂钩,让租房在地位上与购房相比相形见绌;政府职能缺位,让租赁集中区域邻里关系不稳、治安混乱、三教九流汇集而不受待见。因此,长效机制建设离不开市场体系的重建。

最后,住房市场化需要与住房配套同步推进。没有配套公共服务的住房市场无法得到持续的住房需求来支撑,或者只适合击鼓传花式的投机炒作。在广大二三线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之所以由2010年“快速发展”急转为2012年的“严重过剩”,甚至出现“空城”和“鬼城”,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同时,一、二线重点城市的房价之所以快速上涨、居高不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公共服务没有随着城市外延扩张而同步扩张,需求高度集中于优质公共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区。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投资不能走老路 政府应尽快淡出

王瑞霞

本周末有媒体报道,发改委官员给“轨道交通建设4万亿投资”的说法泼了一盆冷水:一来4万亿说辞夸大,实际投资额并没这么多;二来项目审核权虽下放地方政府,但项目批复仍由发改委把关,不能乱建。可见,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重燃已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在笔者看来,各地争上轨道交通项目,热情不减当年,项目可行性固然应充分论证,项目投融资方式更需高度关注。如果投融资模式没有创新,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会否由此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助推楼市泡沫,需要警惕。

轨道交通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根据有关统计,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县市,基建投资中财政投入占10%,土地出让金占30%左右,60%则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贷款融资,可见土地出让收益堪称基建投资的命根子。

值得警觉的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投融资环境已今非昔比,上述基建投融资结构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表现在,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窘迫以及地方融资平台收紧致银行贷款承压,这势必会加大土地出让收入在投资中的占比,而这又会以当地房

价继续走高、楼市泡沫上升为代价。况且,目前三、四线城市楼市泡沫已现,由于楼市的不景气,土地价值也在缩水,如果这些城市基建投融资过多地依赖土地收入作担保,无疑将加大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

可见,如果投资重走政府为主导的老路,一来政府投资压力山大,二来其负面影响会加剧。由于政府投资之弊渐显,引入民间资本,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呼声日隆。新一届政府更是明确提出,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要“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然而,政策能否落地仍需密切观察,跟踪此轮基建投融资方式的变化或可知端倪。

由于基建项目很多具有公益性,若想吸引民资进入,必须创新经营模式,让民资真正有利可图,而实际运行当中确有诸多难题待解。以轨道交通建设为例,引入沿途地上下物业统一商业化开发的香港模式渐成共识,然而,除广州地铁建设等个别项目外,目前跟进者并不多。这其中牵涉土地出让方式变化、经营主体认定等各种复杂因素,背后又涉及地方政府、铁路部门等相关主体的利益协调。由此可见,如何促使政府淡出投资,民间投资落地开花,仍是需要实践中加以解决的课题。

光大乌龙指 股民很受伤



光大证券摆乌龙,股市做多期做空。暴涨暴跌指数乱,大喜大悲股民伤。程序出错先道歉,责任落实再追踪。规范来自严监管,害群之马莫纵容!

赵乃育/图 孙勇/诗

不良贷款反弹应引起重视

莫开伟

据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395亿元,较一季度增长了130亿元;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6%,与一季度末持平。尽管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损失准备总额达15781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11亿元,同比增长18.97%;拨备覆盖率为292.50%,较一季度末增长0.55个百分点,银行系统抵御风险能力较强。但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且银行不良贷款行业性、区域性特征明显,随着时间推进,若缺乏灵活应对之策,银行发生大面积坏账、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此,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需全社会认真反思和重视。

不良贷款的反弹,既反映银行在信贷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也反映当前经济走势令人担忧。

从不良贷款反弹地区看,具有“区域

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内蒙古、福建、山东等东部10个省市。上半年,仅浙江、江苏、山东三省不良贷款余额就高达2471亿元;这一数据占全国不良贷款总量的45%左右,其中新增不良贷款310亿元,亦占全国新增不良贷款总量的60%以上。江浙地区不良贷款率持续增高的原因:一是这些地区信贷总量大、贷款新增额历年位于全国前列,因而不良贷款产生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二是这些地区外向型中小企业多,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大,主要是钢贸、光伏等高风险行业比较集中;由于江浙等地区贷款传统上的互保习惯,造成企业跑路现象增多,更增加了不良贷款风险传导与扩散的可能。而且这种不良贷款区域性特征具有较强的感染性,随着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和融合能力的增强以及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迁徙,不良贷款风险有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蔓延的可能;而且中西部地区企

业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等方面比较脆弱,更容易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可见,不良贷款这种区域性、传染性特征,决定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和全局性,不仅东部地区成了防范的重点,中西部地区亦应保持高度警惕;不仅是银行和企业面临的危机,更是政府亟需解决的经济问题。只有政府、银行、企业三家形成共识,制订全国防范预案,及时采取行动,不良贷款全社会蔓延趋势才会得到遏制。

2009年以来,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为70%以上,还款期为3至5年。今年底至明年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限集中和数额巨大,随着审计力度加大、土地财政收入下降等原因,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可能性增大,信贷资产质量将进一步恶化。

从不良贷款反弹行业看,具有“行业高发”特征,钢贸、光伏、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依然是银行不良贷款高发行业。据统计,浙江、江苏、山东三省2471

亿元不良贷款中,制造业不良贷款约占不良贷款总额的70%以上。另外,从产业链条看,制造业生产流通及上下游企业大都集中在长三角和江浙地区,使得银行业资产质量区域风险与行业风险具有较高的重合性。尽管银监会要求抑制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投放,但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一些产能过剩企业在短期内仍无法摆脱经营困境,不良贷款重灾区的现状难以得到根本改变,不良贷款规模可能还会继续攀升。可见,不良贷款反弹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单靠银行控制难以奏效,要求各级政府和企业银行在产业发展上达成共识:银行要切实执行抑制产能过剩行业和控制融资平台贷款政策,地方政府要克制盲目投资扩张冲动,才能用好贷款增量;同时,银政在化解不良贷款上加强协作,出台配套措施,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企望一蹴而就,要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坚持“分步实施、重点突破”原则,才能盘活贷款存量。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1118@126.com。